

法史人生

张晋藩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法史人生

张晋藩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史人生 / 张晋藩著.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5.5

ISBN 978 - 7 - 5118 - 7686 - 7

I. ①法… II. ①张… III. ①张晋藩—生平事迹
IV. ①K82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3914 号

法史人生

张晋藩 著

责任编辑 易明群

装帧设计 李 瞻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A5

版本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泰山兴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张 12.5 字数 312 千

印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陶 松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7-5118-7686-7

定价:4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目 次

我们这一家子 / 001

破落的书香门第 / 001

我的兄弟姐妹 / 005

我的婚姻家庭 / 009

日本统治下父兄的噩运 / 016

童年记忆中的三大节 / 019

铸就人生的平台——学校 / 024

伪满洲国的小学 and 中学 / 024

旧大学的流亡经历 / 030

别开生面的新大学生活 / 039

六十余载的教学生涯 / 048

教育事业是我一生的追求 / 048

为人师的几点体会 / 057

从人大到法大——教学生涯的重要转折 / 065

筚路蓝缕的学术历程 / 129

百年宪政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一个课题 / 129

《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出版的艰辛 / 133

- “中华法系”研究的承接与开拓 / 137
- 《中国法制史》第一卷的出版 / 142
- 主编高校法学通用教材《中国法制史》 / 145
- 撰写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设想 / 147
- 开展部门法史研究的新领域 / 150
- 倡议研究法文化史 / 158
- 传统律学的研究 / 162
- 倡议研究比较法制史 / 164
- 研究台湾法律, 组建台湾法律研究所 / 167
- 台湾法律研究所活动的开展 / 176
- 媒体对台湾法律研究所的报道 / 179
- 主要研究成果——《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人民关系法》
(建议草案) 的制定 / 181
- 主编《中华大典·法律典》 / 198
- 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 / 205
- 鉴古明今的法史研究 / 211
- 《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的一、二、三版 / 218
- 由中国法制史转向中华法制文明史 / 222
- 撰写《清史法律志》 / 236
- 为“智库”提供法制历史的借鉴 / 239
- 从一份科研考核表说起 / 246
- 一位记者的话 / 249
- 我所经历的政治运动 / 262
- 大青山下的土地改革 / 262
- 1951 年冬的“三反”运动 / 267
- 打击黑心资本家的“五反”运动 / 268
- 深挖胡风分子的肃反运动 / 269
- “反右”与“交心”运动 / 270

反对旧法观点带给我的麻烦 / 273	
大跃进和对教学的冲击 / 280	
公共食堂的所见所闻 / 283	
饥饿的年月和反修教学检查 / 285	
从“五反四清”到“文化大革命” / 288	
“五七干校”的日日夜夜 / 297	
不了了之的“清除精神污染” / 307	
让中国法制史学走向世界 / 312	
中外法文化交流的启动 / 312	
首次讲学美国 / 315	
首次讲学日本 / 331	
第二次讲学美国 / 337	
中美法学教育交流的迈阿密会议 / 352	
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及后续 / 353	
参加中美政治学会年会及凤凰城讲学 / 357	
横滨大学讲学与第三次访日 / 360	
韩国讲学及参加后续的学术会议 / 366	
波特兰之秋 / 370	
难忘的加州大学讲学 / 375	
召开洛杉矶中国法制史国际会议 / 379	
德国西柏林大学研讨会后漫游欧洲 / 380	
中以法文化交流会议及古城见闻 / 383	
两度访台 / 386	
情系香江 / 392	
编余的话 / 395	

我们这一家子

破落的书香门第

我的祖籍是山东黄县诸由观村，在该村，张家是大族，子弟众多。根据居住的情况，村东为东张，村西为西张，我们这一支属于西张。祖父辈（裕字辈）兄弟四人，大爷二爷经商。据说生意全盛时，自山东至沈阳沿途皆有店铺接待，无需住旅店。三爷读书应试，曾经考取登州府十州县第一名秀才。村中凡是准备考乡试的读书人，多向他去请教，有时门庭若市，被当地称为诗书门第。我父亲少年时代也跟三爷爷读书，既没有参加农业生产，也不管家里的商业经营。在我父亲十六岁那年三爷爷因准备省试刻苦读书，不幸英年早逝。父亲保存了他写的一篇小楷，字非常飘逸，曾经把它装裱过，后来不知何时丢失了，为此我父亲非常懊丧。我爷爷排行第四，负责管理家务。在我父亲青年时，大爷爷、二爷爷相继去世，从此家道中落，各支分家另过。在我幼年时父亲经常讲起旧居有五进院落，还有一个西大园，有很多果树、香椿树。1988年中央组织部组织三十一位专家去山东疗养，我顺便到老家即诸由观村去看看旧居。房屋虽然还很坚固，但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宽大，每个

院落的正房只不过三间而已。我父亲分得的房产，为了闯关东，便都变卖了。

我父亲名字叫张崑林，十六岁时到沈阳，他和大多数人的闯关东不同，先是在成城中学补习文化，后为了生计到一家丝房（类似今之百货店）做帖账，后升任账房先生，即今之会计。他与我母亲结婚后经人介绍到北满金川县税务局工作，后又调至沈阳市税务局工作，直到“九一八”事变后离职。父亲可能受家学影响，学历不高，但酷爱读书，尤其喜读历史书籍。除读书外，他精于数学和珠算，这可能和他早年做账房先生有关。他也精于书法，大小楷都很精彩。由于父亲喜欢读书，在一个大书柜中装满了书籍，据我回忆藏有《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曾文正公全集》《饮冰室文集》，还有很多医书，如《医宗金鉴》《景岳全书》，还有《荡寇志》《青楼梦》之类的小说。父亲生性至孝，我母亲常常给我们讲一件事，就是我祖父有一次用他的拐棍敲打我姐姐，我父亲劝阻说，孩子有病刚好，又打她做什么。祖父顿时大怒，用手中的盘子砸向父亲头部，顿时鲜血流出，周围的人都赶忙来劝阻。据母亲讲，我父亲当时哈哈大笑，对大家说都是自己不好，惹祖父生气了，而且把我祖父扶到房间里休息。大家对父亲的孝顺是交口称赞。这件事情母亲也常常用来教育我们。在我记忆里每当除夕，父亲总是感情沉重地说：“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位老太爷”。

在我上小学之前，经常在睡前听父亲给我讲《三国演义》，关公过五关斩六将、诸葛亮七擒孟获等故事都使我悠然神往、乐不思寐，至今记忆犹新。上小学以后，父亲常常选择一些古文教我背诵，我背过之后，他就要我躺在他身边闭目休息，要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最难忘的是他教我读赵孟頫的《读书乐》，他朗诵给我听。春夏秋冬四季读书各有乐趣。虽然当

时许多还领悟不到，但读书最乐在我幼小心灵中便扎下了根。

除读书外，父亲还教我写毛笔字，开始时写柳公权的《玄秘塔》，后来又写颜真卿的《多宝塔》，我不太喜欢颜体，嫌它太古板，而是喜欢赵孟頫的赵体，但父亲一直让我写颜体。为了提高我对书法的兴趣，每年春节的春联都是让我写。经过不断练习，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已经可以写出一手颜体字。

父亲也很注意购置玩具，用来启迪童稚的智慧，在这方面他不吝惜花钱。我最好的一个玩具是有轨列车，大约半米直径的轨道，有机车头、煤车，还有三节客车，拧足发条可以转三圈。我骑的小三轮车在当时也是最好的。这一点对我很有影响，我在给孩子们购置玩具时也从吝惜金钱，觉得对启发儿童的知识确实是大有裨益。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辞去税务局的职务，开始经商。最初投资开设一个染绣花线的小工厂（实际是一个作坊），由我姨父程守业经营，字号“万兴长”。不久父亲的同乡胡某某找到他，请他经营一个人造丝绸的批发店，店名“亿泰公司”。父亲在这个公司担任经理，持有少量股份。在获得盈利的基础上，又在城西张士屯合资开办了一个很大的烧砖厂，同时还附设一个建筑材料的零售店。这时的父亲俨然是一位资本家了，家里的生活也比较富裕，经常雇一个佣人料理家务。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加紧对东北人民的压榨，父亲在“经济犯罪”的迫害下破产了，断绝了经济来源。至解放前夕，生活一天天拮据，有时候还要靠当小学教员的哥哥的接济。为了筹措我和姐姐的学费，他卖掉了仅有的住房，开始赁屋而居。



1950年摄于沈阳

解放以后，父亲在一家制造油毡的工厂担任职员，生活很稳定。1950年暑假我和姐姐回家探亲拍了一张照片，反映了解放后他们生活的安适和颐悦的心情。1953年该厂因“三反”倒闭，父亲便在我家的住地沈阳市南市区北二经路担任居民委员会主任。他很热心这项工作，也很有威信，直到1956年来北京同我一起生活为止。

每当他谈起居委会主任的工作时，总是眉飞色舞，非常得意。1977年1月，父亲因心脏病去世。他一生保持着山东人直率正直的性格，看到亲友中的“毛病”都不客气地指出，为此母亲常常规劝他，但他坚持不改。也正因为如此，他在亲友中赢得了威信。

我的母亲侯淑君，出生在沈阳市于洪屯一户中农家庭，她不识字，但精于刺绣和烹饪。每到端午节，她总要给我用彩线缠一个小粽子、小笊帚、小荷包，都很精致。解放以后，她参加了扫盲识字活动，至1956年来北京和我们共同生活时已经认识几百个字了。她为人忠厚、善良，善于操持家务，而且待人宽厚。母亲常常跟我说起，她怀我临产前，她在院中洗衣服，一个学车的青年把她撞倒了，盆也碎了，衣服也都溅湿了。这个青年吓得不知所措，邻居们跑来把我母亲扶起，我母亲让大家都别声张，不要吵醒午睡中的父亲，她换了衣服，安安静静

地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但是邻居和那位青年都捏着一把汗，直到我平安降生，大家才放下悬着的心。母亲讲这件事情意在教育我们宽厚待人。我小的时候体弱多病，母亲经常带我去医院，还经常带我去看电影。每当中间休息时，我们便离开。日子久了，电影院的负责人也熟了，便问我母亲为什么每到休息时便不看了。母亲说：“看电影是小事，主要是带孩子出来散散心。”母亲晚年不幸患有老年痴呆症，1976年1月去世。一年后，父亲也去世了。民间流传“女等男整一年”，意思就是妻子先逝，一年后丈夫也会死去。当然这是针对老年夫妻而言。

我的兄弟姐妹

我的哥哥张晋文，长我六岁，很有语言天赋，日语很流利，又善于表演，但数学极差。在我家生活较富裕时，他已经是青年了，因此沾染了一些浮华的生活习惯，喜欢喝酒。为了他的亲事，父母亲颇费周折，经媒妁介绍，看了七八个女孩子，都不甚满意。最后看的一位与我母亲同屯的高家的女孩。高家是地主，在于洪屯是有名的高家大院。这个女孩叫高秀兰，人很隽秀，但我母亲嫌她幼年丧母，命运不好，还在犹豫中，而我哥哥同意，于是就说定了。他们结婚时，恰逢我父亲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因此来家道贺的宾客很多。但我嫂子的命“确实”不好，过门不久，我父亲就因“经济犯”被捕入狱。她生的第一个孩子，乳名叫“泰生”，是我父亲在狱中给他起的，取“否极泰来”之意。不久，他们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叫“新生”。我哥哥共生了七个男孩，一个女孩。长子益群即“泰生”，次子益元即“新生”，三子益平，四子益光，五子益智，六子益刚，七子益民，女儿叫玲玲。我哥哥在中学毕业后，为了避免被抓做劳工，一直做小学教员。日本时代非常重视小学教育，也就是从小学

抓起，培养亲日的思想感情，所以小学教师免于劳工。

1948年，北平发生了镇压东北流亡学生的“七五”事件。我和姐姐都是东北流亡大学生，发生了这个惨案以后，父母亲极为担心，就让我哥哥一家也到北平来，顺便照顾我们。解放后，他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分配到香山慈幼院小学部做教员。当时小学教员的工作也不能维持他的生计，于是他辞职到南郊红星农场从事农业生产，他的孩子都辍学了。三子益平是少先队的大队长，学习成绩优异，辍学时班主任很是惋惜，到家反复动员孩子们继续读书，但没有结果。我哥哥1982年去世，不久嫂子也去世了。他的七子一女早已成家立业，长子益群已经七十二岁了，次子益元也六十八岁了。哥哥一家不仅人丁兴旺，改革开放后，也可以说是人财两旺，每家都有房产，享受了改革开放的实惠。每次家庭聚会时，四十多人，孙辈、曾孙辈我都叫不出名了。我和哥哥手足情深，在他生活困难时，不断给予接济，他的孩子们也都亲见亲闻，所以对我尊之若父，非常关怀。

我的姐姐张梦梅，长我一岁，1946年与我同时在私立东北中正大学先修班（预科二年制）学习。1947年我考入本科，1948年5月我们一起因迁校流亡到北平。1949年9月她和马原（后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一起由中共北京市委保送到中国政法大学学习。中国政法大学是以原朝阳学院为基础建立的一所新型的政法院校。谢觉哉为校长。该校设一、二部轮训干部，设三部招收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本科生。至1950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中国政法大学便宣告撤销。一、二部学员分配工作，三部学员全部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1950年9月，姐姐和我又一起分配做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第一届研究生。1952年毕业后，我们同时留在中国人民大学

律系执教。1953年，同届研究生中田某在中南政法学院工作，他到北京来，调我姐姐去中南政法学院任职。这时，姐姐已与第二届的研究生杨堪恋爱，杨堪留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但我姐姐填表时没有注明与杨堪的关系，就这样田某把我姐姐调走了，此事令他们终生懊悔。1953年，他们结婚了，杨堪也随即调去武汉中南政法学院工作。我姐姐聪明睿智，口才极好，讲课受到欢迎，人也非常漂亮，曾任该校法律系主任，现退休在家。我和姐姐自幼感情很好，一起玩耍。记得在我们院内，冬天时父亲泼水为冰，在不足四米的一个小冰场内我和姐姐练习滑冰。在读研究生时，我们都喜欢跳舞，每个周六大家一块去跳舞。

我姐夫杨堪是福建闽南人，厦门大学法律系毕业，1951年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制史教研室读研究生。他很内向，言语不多，但很有研究能力。我们两人很要好，经常一起打球，一起划船。1953年夏，他即将赴武汉，我约他一起划船，每人一条船绕行颐和园昆明湖一周。当时游人少，我们尽情享受湖光山色的美景。1955年，我和杨堪还有张希坡共同出版了《旧中国反动政府制宪丑史》的小册子。1979年，在参加法律史学会成立会后的返京途中，在列车上，我约他撰写《中国法律思想史》，并共商提纲，此书于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我承担《中华大典·法律典》的主编时，我约他负责经济法典的主编工作。

杨堪身体虽瘦弱，但体质很好，现在虽耳聋眼花，但别无他病。我经常与姐姐通话，去年十月我和林中还有小女儿益宏、侄儿益民夫妇一起去武汉看他们，拍了不少照片，还录了像，看到他们身体健康，精神状态也很好，很放心了。我姐姐生有一子一女。女名杨博，现为湖北省财经政法大学计算机专业副教授。子名杨刚，曾在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攻读硕士，现为中国银行上海支行的负责人之一。



2012年10月，武昌姐姐家聚会



哥哥晚年时照片



姐姐青年时照片



2011 年与侄儿、侄孙辈合影

我的婚姻家庭

1930 年阴历 7 月 19 日子时，我出生在沈阳市大北关伊家大院。房东是晚清旗人统领，是高级武官。在我四五岁时，伊家的孙子十三岁左右，带我们去他家看他祖父留下的腰刀。伊家当时已经没落了，子弟游手好闲。在我十一二岁时，可能是伊家给我哥哥介绍对象，父母亲曾带我去过伊家，官僚子弟的傲气全然不存在了。他们非常欢迎我们去他家，称我母亲为老姨，称我父亲为老姨夫。这段亲事并没有做成，以后联系就中断了。

我在沈阳市第一模范小学读小学，小学毕业后考入伪满奉天市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八一五”光复后改为市立第三中学）读书。1947 年考入私立东北中正大学本科学习。解放后先后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2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执教，1983 年在原北京政法学院基础上成立的中国政法大学调我去主持研究生院工作，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详见后）。

至于我的婚姻，是和保送留苏学习联系在一起的。1954 年

春天，系总支副书记徐某某找到他办公室谈话，态度很严肃，颇有点神秘。他问我，你家里都有什么人，父母靠什么生活，你是否接济他们，假如你不接济，他们能否生活下去。当时我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直到最后，这位徐书记才亮了底牌。他说，组织培养你，要保送你留学苏联读研究生。当时留学苏联，不仅是极为难得的学习机会，更是政治上的极大光荣。只有组织充分信任和要加以培养的人才才会保送留苏。我听了之后，真是大喜过望，立刻写信告诉父母、姐姐。从此之后不断地写材料，包括家庭成员的历史情况和政治状况以及各种社会关系都一一详查。在我的材料中，曾经写过我嫂子的堂兄当过保长，对这一社会关系让我写了多次。我说此人我从未见过，只是听闻而已。在政治审查之后便开始身体检查，这一关也很难过去，当时检查出我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在同仁医院第一次做心电图，我很紧张，怕触电。这时法律系一年级同学中有四位保送苏联读本科生，其中一人是林中，后成为我的夫人。在准备留苏期间，本科的四位同学经常找我辅导历史，由此开始了接触，后来虽然通过了考试，但由于我的可疑的风湿性心脏病和林中所患的重度鼻窦炎，最后都未能获准留苏。

1954年9月，我为二年级讲授中国法制史，在这期间我组织了课外科学研究小组（这活动我从1953年就开始了），林中做小组长，接触较多，从学问、生活到家乡琐事无所不谈，彼此都怀有好感。我们的恋爱就从科学研究小组的活动中开始了。至今我们仍然为中国法制史科学研究共同奋斗。1955年7月27日，我们结婚了。

最近，林中应约撰写一篇军大的回忆录，其中概述了她的童年和学习经历：

我出生在福建省连江县马鼻村，父辈兄弟二人，

伯父务农，父亲由于身体瘦弱而又天资聪颖，因此祖父送他去福州一所私立学校读书，返乡后准备教书为业。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生活很美满。当我还在襁褓时，父亲就去世了，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几乎是零。据说父亲的死因是由于分家引起的。伯父当家，比我父亲大十几岁，他说：“我父亲从没下田劳动过，在外边读书花了家里的钱，所以不能分家产。”后经亲族调解，才分了少许薄田。父亲由于气恼一病不起，逝世时才二十多岁，母亲矢志不再嫁，为了延续香火抱养了一个弟弟。母亲为了寻找精神寄托，在教会办的“女学习”扫盲读书，文化提高很快，可以读圣经了。这对她知识开拓、增长见识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她能克服各种困难，立志培养我读书。她说过：“即使我去要饭，也要让我女儿多读点书。有了工作，能自立了，在家里才有地位。”她四十刚过就去世了，弟弟到伯父家去放牛，只管饭吃。我坚持在省城公立学校读书。我作为清寒生，成绩又好，一直享受公费。

1949年“八一七”福州解放，当时我正在读高三，此时我义无反顾地决定参军，走进了华东军大福建分校的校门，入伍了。我当时认为只有走革命这条路才能摆脱困苦无靠的生活，才能有出路。

华东军大的校长是陈毅元帅，福建分校的校长是叶飞将军。福建分校下设若干大队、中队、区队（相当于连队的排）。我被分配在第一区队第二班当班长。预科结束后，我被调出军大，选送到第十兵团保卫部保卫干部训练班学习，后又到师政治部、干部部工作。1953年转业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7年毕业后，我先后在天